

吴文化在近现代无锡的历史嬗变

——侧重于文化教育方面

胡晓文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江苏 无锡 214045)

摘要:自泰伯奔吴,吴地逐渐形成的崇文重教、务实理性、柔性隐逸等精神内核在无锡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展现。近现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促使吴文化在无锡的区域性呈现出不断变化,如民族工商业在这里起步,“无锡国专”创办和家庭教育演变都体现着吴文化在无锡的地域性变化。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以期对无锡区域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无锡;近现代;吴文化;江南;嬗变

中图分类号: G127;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7)04-0248-03

一、锡地吴文化的人文积淀

地处太湖流域的无锡是江南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学家认为,无锡的原始文化先后属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 12 世纪商末,泰伯携二弟仲雍奔吴,断发文身,自号勾吴,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伯渎河,为吴地带来了最早的灌溉、航运等水利技术。周武王寻找泰伯、仲雍的后代,得仲雍五世孙周章,封其为君(前 1066),国号吴,梅里曾是吴国都城。泰伯、仲雍为吴国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而泰伯、季札先后让国的义举也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原型”。吴国自强不息,善吸纳周边先进文明,通于内陆,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春秋后期,诸侯争霸,吴阖庐伐楚降越,国势强盛,当时的江南人骁勇善战,但同时也饱受战乱之苦。汉高祖五年(前 202)始设无锡县。自六朝始,中原战争频扰,人口南迁,历史上三次(永嘉、安史、靖康)大迁徙,促成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江南一带兴修水利,农耕和交通发展迅速,无锡人口大增。

江南繁盛,才俊多风流。江南无锡由商周的尚武之气逐渐演变为魏晋后的崇文之风。一方面,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杨广凿通江南运河,途经无锡,漕运大开向来是商品贸易繁盛的基础,这使江浙一带在唐以后成为我国财政来源的主要区域。另一方面,隋唐科举兴起,宋朝分权制衡,人们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而亟亟于仕途功名,无锡地区对教育文化的重视日渐显现。宋庆历四年(1044),无锡知县张洵奉召于城南束带河畔建县学——学宫孔庙,宋政和元年(1111),杨时于城东驳岸上建龟山书院(后东林书

院),宋嘉定十六年(1223),胡埭人蒋重珍状元及第,其为无锡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可为明证。

江南富庶,奇人好旅游。明清的江南文士,走遍名山大川,非主流思想滋生,产生了许多不慕科举好实学之人。例如,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几何原理》,张景岳编《类经》《类经图翼》等,江阴徐氏更是一例。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的徐霞客,其祖上梧滕徐氏曾是江南巨富,嗜书如命,家里藏书甚多,被称为“文献巨室”,徐家一心想通过科考光宗耀祖,徐经、徐洽、徐衍芳等连续几代科考失意,到了其父徐有勉,志趣大转,好游历,不走仕途。《徐霞客游记》载徐霞客更是自幼“酷好奇书,客中见未见之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半得之游地者”,他“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却能不被“图经志籍所蒙”,决意走出故纸堆,进行实地考察。

当明清时期无锡地区士族文人特殊的政治能量被逐步显现后,明清两朝逐渐加强了集权统治,建立起更为缜密完善的专制制度,加强了对江南士人缙绅的压制,不许书院结社,不许非议朝政,不然坚决予以打击。明朝东林党祸,其镇压极为惨烈,给无锡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也逐步使无锡人形成了气质上偏于细致内敛,精神上务实理性,行为处事上自有其经纬却不爱显山露水的特点。

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科举废止,西学兴起。江南无锡,民族工商业在这里起步,各种思潮从沿海涌入,新旧观念产生激烈碰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7-04-0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ZWB004);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基金(项目批准号:苏教师〔2014〕23号)。

作者简介:胡晓文(1977—),女,江苏无锡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旅游商贸分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促使经济能力、财富资源成为衡量人的标准,这使该地区的士绅观念和身份也产生了变化,从以前的有地位、有钱、有闲的精英阶层,变成了虽以思想家启蒙者自居却也要自食其力的普通民众。在心理上,这些士绅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却又割舍不断,面对崛起的新贵,有鄙夷、有羡慕更有无奈。如同《围城》中的方鸿渐遇到财大气粗的孙柔嘉的姑母,在世俗化了的价值观面前,他感到无比瘪涩,现实处境让他们尴尬不已,固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在时代的冲击下变成颓势。

自泰伯奔吴,吴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中华大地其他地方的地域文化之美互相交织,在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力等多个方面呈现出独特风貌。而近现代以来,吴地处于江南沿海西学东渐的前沿,更以其开放包容的姿态,接收着各种不断变化的思潮。近现代,无锡的区域发展和区域文化,既得其精髓,又在沉淀稳定中推陈出新,故而我们既可追根溯源,远及吴文化之源头,也可审时度势,研察吴文化的今昔发展与随势变迁,探讨其历史嬗变。

二、锡地吴文化的人文地理成因

江南形胜,锡地繁华。吴地文化特征得以固形和演变,与江南的水域环境不无联系,而这种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又缓慢而固执地影响着该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

无锡具有独特的自然气候和水运条件,其既处于大运河和锡城运河交汇处,又属太湖水网平原。南宋有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可见,无锡早在宋元之时就是江南主要的产米区。王世性在《广志泽》中载:“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明清时期,无锡先后形成了布码头、米市、丝市,贸易往来十分活跃。无锡在光绪年间已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据《无锡县志》记载,抗战前夕,粮食每年集散量最高可达1200万石(9亿公斤),粮食的集散总量、加工能力、仓储容量、运行能力在全国四大米市中均居首位,1937年粮行总数达392家。锡地在明代中叶起就有着“布码头”之称,清诗人杨伦在《芙蓉湖棹歌百首》中描述当时布码头的盛景:“花布开庄遍市廛,抱来贸去各争前。要知纺织吾乡好,请看江淮买卖船。”布匹交易连带着米棉酒瓷等交易,贸易异常频繁;自泰伯奔吴将渭河流域先进的栽桑养蚕技术传入锡地,其养蚕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清光绪六年(1880),新安乡蚕农张少甫改良蚕种,产出的蚕茧丝量增多,后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丝茧市场。1930年,全县有茧行549家,占全省茧行总数的40%。与此同时,缫丝业也发展迅速,周舜卿、薛南溟两家发轫,尤其是薛寿萱开办了华兴制丝养成所、组建通运

生丝股份有限公司,在对丝厂进行改革后,无锡成为全国缫丝行业的领头羊。

明代以后,无锡传统的劳作方式和劳动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又受上海的辐射影响,民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若没有遭受之后的战乱和破坏,兴许会发展得更扎实。随着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的连接,锡地贸易往来更为活跃,商店鳞次栉比,集市繁盛密集,逐渐成为苏南一带的经济中心。辛亥革命后,时局并不安稳,无锡先后遭受了齐卢之战、1920—1930年的经济危机等,但较之全国其他地区,总体情况还不算太坏。“七七”事变后,无锡地区的城乡遭受战乱重创,经济凋敝,人口流失,城镇破毁,米行十之八九被烧毁。据《无锡县志》记载,日伪时期,日军一方面由城镇到农村对无锡进行了多次经济封锁、清乡扫荡,另一方面又进行经济掠夺,火烧商业用房5万多间,致使物价全面飞涨、日用品奇缺,“抢米抢棉”事件时有发生。

无锡以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人们只需脚踏实地、勤勉劳作、买卖运输精打细算,便可获得较为殷实的生活。吴文化中的重商重利、内敛精明、讲求实际的特征在无锡表现得尤其明显,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文明在这里起步自有其内因,也是其必然结果。

三、锡地吴文化在近现代的历史嬗变

江南一带人文渊薮,与吴文化重视教育不无关系。受大环境的影响,近代以后,西方文化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新质文化中人的觉醒和教育启蒙是两个绕不开的内容。此时的无锡,更是得风气之先。1905年废科举后,经有识之士推动,无锡兴办学堂渐成大势,产生了一大批教育家,如胡雨人、顾倬、侯鸿鉴、杨荫榆、钱基博、钱穆、顾毓琇、钱伟长等,他们早年受过严格的旧式教育,视野开阔,学养深厚,其中更有一些留学海外,西学造诣较深,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无锡整体的文化走向。

(一) 西化新学的普及和“无锡国专”的特立独行

19世纪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人们对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一部分人走出国门,探究救亡图存的良方。“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一生未走科举道路,虽然他的父亲薛湘八股文极佳,时称“薛调”,但薛福成对八股深恶痛绝。他出使多国,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和教育制度,早年就在《选举论》《上曾候相书》中表达了他对培育新型人才的重视,指出科举取士的弊端,更在出使西洋对其教育制度作细致考察后,一再呼吁要重视教育普及和专业化。他在《出使日记》中道:“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犹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

原欤？”他主张学科专业化，主张教育要从改革制度开始，“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

无锡于清末民初相继建立了竣实学堂、三等蒙学堂、东林学堂、胡氏公学、果育两等学堂、廷弼学堂、竞志女学、鹅湖女学、匡村初等小学堂、公益小学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十几所新式学堂，这些学校大多在1905年废科举前废除了《癸卯学制》中“讲经读经”的课程，钱穆《师友杂忆》记载：“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辛亥革命后，学堂改为学校，《无锡县志》载当时的小学共145所（其中公立63所），曾和南通等地成为当时全国的“义务教育模范区”。1935年，有小学402所，儿童入学率为37.9%。

新式学堂发展迅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由背后鼓荡转为正面对话。1920年6月22日至25日，美国教育家杜威在第三师范学校讲学，内容包含“试验主义”“学生自治”“学校与社会”“现今世界与教育思潮”等主题，受到无锡教育界的欢迎，当时《新无锡》报载“第二日会场听讲者达二千余人”。可见，西方文化理念已深入锡地学界，曾经的书院式教育传统及经世致用的教育风气与杜威“平民教育”“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相契合，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需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920年11月，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以下简称“无锡国专”），其成为无锡高等教育之始。馆长唐文治，感时伤怀，借鉴江阴南菁书院的方法，着力继承中国传统书院精神，注重提高学生的修养品性及自我管理能力和能力。面对新文学强势的呼声，“无锡国专”依然保持国学特色，吸收新学合理的办学机制，设学分制，分选修必修课程，还经常聘请国内外经济学或教育学专家（马寅初、唐庆增、Carl H.Becker和P.Langevin等）开展讲座。在当时，虽“正常毕业者不到一千人”，但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国学专家学者，在西学浪潮强势推进的20世纪上半叶，意义深远。“无锡国专”对传统诗礼文化的重视和继承，能有效抑制工商业文明带来的弊端和流俗。而“无锡国专”与曾经的东林书院相比，秉承了书院式讲学传统，引入了新文化因子和办学机制，是无锡近现代文教史上值得一书的辉煌。

（二）家族教育的传承和嬗变

进入近代，因受西学普及、社会动荡和战乱等因素的影响，江南家族教育受到极大冲击，只留存于一些传统士绅家庭中，他们非常重视子孙德、能、学问的养成。无锡“钦使第”薛氏故居留有一幅薛福成儿时手书：“每逢三、八日作文一篇，除廿八日作赋外，计每月作文五篇，需当日交卷……每月逢廿八日作赋一篇。每月逢四、九日，上半日写字，下半日作八韵诗一首。”可见，当时家族教育较为规范和严厉。但太平

天国战乱、父亲的去世及八国联军入京等事件，使薛福成看清了家族教育的最终目标并非科举，而应是工商立国、经世致用。传统家族教育在文化传承、学脉流传、诗礼氛围营造等方面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

而无锡绳武堂钱氏家族更为典型。城中“七尺场”钱氏故居有对联：“以蔽风雨，曰止曰时，相协厥居，孤始愿不及此；既勤垣墉，爰众爰有，自求多福，汝兄弟好为之。”知足、和睦、仁厚、勤俭是其家风。钱家是教育世家，钱维桢（钱基博祖父）、钱福焜（钱基博伯父）、钱福炯（钱基博父亲），以及钱基博自己皆以教书为业。钱氏家族的教育形式更多地表现为家庭教育。钱福焜既是钱福炯的二哥兼业师，又是钱基博、钱基厚（孪生）伯父兼业师。钱基博、钱基厚兄弟俩在4岁起由母亲教他们认字读书，半年后授读经书，后因母亲家事日繁，由兄长钱基成或堂兄钱子绍来教授，这样钱基成既是他们兄长也是他们的业师。兄弟俩11岁开始作史论，晚上由父亲钱福炯批改，14岁读《资治通鉴》等大书及诸子百家，能与师友谈笑自若，纵论古今。

时世变化，旧式教育临近终结。在新旧之间，人们的抉择难以两全，也难以轻言放弃，但士绅家庭求学上进的风气并没有改变。仍以钱氏为例，钱钟书从五岁起，更多的不是接受新文化，而是在家受其父钱基博的教诲，通读《古文辞类》《骈体文钞》等著作，写信必用文言文，不到20岁就已能替父作序。虽然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无锡地区战火不断（1924年齐卢之战、1927年北伐战争、1931年淞沪之战），兵荒马乱中学校经常停课，但钱家停课不停学，钱钟书、钱钟韩兄弟俩多是自主学习，功课从未落下。钱基厚的《孙庵年谱》及钱基博的《〈古籍举要〉序》中也多次提到，在家庭教育中，钱家营造了浓厚的读书写诗、说理论世的氛围，无论“基”字辈还是“钟”字辈，他们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中成长，钱家的家庭教育可被看作是无锡地区传统家族教育的一个缩影。文脉相承，绝不是一两辈人的简单积累，需重视子孙的立德、立身、立人，经百年的努力，以达到学养双修的至臻境界。

参考文献

- [1] 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 无锡县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 [2] 刘桂秋. 无锡国专编年事辑[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1.
- [3] 刘桂秋. 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4] 杨绛. 将茶饮[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责任编辑：梁士奇）